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五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二一期（zk2005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二〇年五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千秋功罪】	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如何解读历史人物	金光耀
【史海钩沉】	为领袖出书的文革十年	陈徒手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三）	阎长贵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千秋功罪】

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如何解读历史人物

• 金光耀 •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如何来解读历史人物，首先我想到的就是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就是我们看待和解读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方法。这句话是刘少奇说的，它告诉我们看历史，解读历史人物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普通人的立场上，而不是帝王的立场上，某个集团的立场上。我们就通过刘少奇的生平以及对他的历史叙述和评判来认识和理解这句话。

◇ 刘少奇经历：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中央委员  
1931年，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4年，参加长征  
1935年，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45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委员长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66年，文革中打倒  
1968年，永远开除党籍  
1969年，去世  
1980年，平反

这就是他简单的经历。

中国共产党以中央的文件，即官方的文件，对刘少奇有过三次叙述。我们就从这三次叙述的变化，来看党对刘少奇叙述和评价的变化。

对刘少奇为党做的工作和贡献做出的第一个评价是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以来第一个系统地总结自己历史的文件，而且奠定了党以后书写自己历史的基调。这个基调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历史，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正确路线与各种各样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此次决议定下基调以后，我们党的历史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书写的。

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是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被书写的，在毛泽东之后，中共党内被正面提到的人物就是刘少奇，其他提到的都是反面的人物，如陈独秀、王明等。毛是整个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所执行的路线是一个正确路线，刘少奇的路线同样是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成功也证明了刘少奇这个策略的正确性。这里对刘少奇有很多的称赞，实际上奠定了刘少奇在党内第二位的地位。

刘少奇尽管入党很早，1921年，是第一批党员，但他成为中共的高层，即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是在1931年，在党内的地位和资历排在他前面的还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朱德、周恩来。为什么在1945年党做第一个关于自己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刘少奇一下子位置超过了朱德，超过了周恩来呢？实际上这和党历史的发展是有关联的。

根据中共党史，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从遵义会议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十年间，毛泽东逐步确立并巩固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地位，但这个过程要不断地与党内各种错误路线进行批评和斗争。在和错误路线的批评和斗争过程中，刘少奇始终站在毛泽东的这一边，尤其对1927年以后十年中间党内错误路线在白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了猛烈批判。所以和毛结成了非常亲密的战友关系，刘少奇在历史决议中间的地位，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

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期和紧接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做了非常完整的理论阐发，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产物就叫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最终确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代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去年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是一位研究中共党史非常精深的专家。他认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第一代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延安圆桌会议的模式。圆桌会议是相对比较平等的，也就在五大书记中形成了一个领导集体，这是一个圆桌会议的模式：毛泽东是领袖，有最后决定权，但是另外几个人各司其职，大家是比较平等的那种圆桌会议的模式。在这五个人中间，刘少奇是排在第二位，实际上是在党内仅次于毛的地位。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两个人密切合作，毛泽东有领袖气魄、战略眼光，刘少奇组织能力很强，而且也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他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每个党员几乎是人手一册。两个人的结合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并且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两个人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但是两个人的个人气质相差很大。毛泽东就像他写过的很多诗词一样，比如他写的《满江红》：“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做什么事情都要争朝夕，要快，要不断地快马加鞭，而且他的志向是全世界。他在诗词里面写“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种舍我其谁的气魄；他也写“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不仅是中国还是整个环球。刘相对来说稳重踏实，按规矩来办事。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毛刘二人都想将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但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两人想法并不总是一样，有时候会产生分歧。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说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刘少奇就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但是毛泽东想要快速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般而言，刘少奇总体上以毛为主，改变自己的看法。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也是刘少奇积极推进的，包括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最早出现时也和刘少奇有关。刘对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的看法发生变化是在1961年。因为大跃进的失败，1959—1961这三年我们国家进入了经济困难的时期。

1960年10月，湖南宁乡花明楼乡的老百姓（刘少奇是宁乡花明楼乡人）给刘少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刘主席，我们天天在饿肚子，得了浮肿病还不能说，说了就要挨打饿饭，搞不好就说你是“反党、反三面红旗”，要送劳改。饿死的人只能说是自己病死的，死人常见，一个生产队，饿死的人怕不有几十上百呢！现在我们心里只想吃一餐饱饭，也没枉来一回人世。他们还写道，刘少奇是花明楼的人，既然做了国家主席这么大的官，要让乡亲百姓百世千代颂你的好才是真好，不要让后人说起花明楼出过一个国家主席，在他的手上饿死的宁乡人有成千上万。

这封信对刘少奇是有触动的，他很在乎人民的呼声，在乎历史的书写，对历史有敬畏感。1961年的四、五月份，他到宁乡和宁乡边上的长沙县待了44天，他轻装从简，回到自己的老家花明楼，就住在儿时住过的旧房子。当时我们说经济困难，一般都认为是自然灾害，经他实地调查发现，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农民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听到这些声音以后，对整个大跃进开始了反思，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一个讲话。在这之前，毛泽东讲到经济形势的时候，包括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习惯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就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错误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是九比一。刘少奇这次讲到是三比七，而且某种程度上还是倒过来的三七，有些地方主要不是天灾，人祸是更严重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也知道这次问题很严重，所以做了自我批评。

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如何看待当时的形势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毛刘的分歧加大了。毛认为到62年，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接下来就应该是反弹，应该是一天天越来越好。但是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工作，他认为形势很严峻。他相信这是非常时期，同意各地采取一些突破原来人民公社的做法，包括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的方法等等。

对于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应对措施，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就批判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尤其对采取主动包干到户的做法，毛主席做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单干是不要社会主义。在克服经济困难的过程中，毛刘的分歧加大。

毛刘走到最后分道扬镳，196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文革爆发初，毛泽东写过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这张大字报中就追溯到62年的右倾，就是因为刘少奇在这时把形势估计太坏，还同意包产到户的做法。1962年以后，毛对刘少奇及其他一线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陈云等人越来越不满，这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起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写了那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公开地表明和刘少奇是两个司令部，这是和刘少奇彻底的分手。同一天，毛泽东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

从1945年的七大直到八大，刘少奇总是排在中央的第二位，重新改组的政治局常委增补了另外几个人，刘少奇从的原来常委中排第二位到了第八位，林彪排到了第二位。此后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称呼没有了。也是在同一天，周恩来通知他，今后不要参加接待外宾的活动了，他做国家主席的职能也被停止了。

这以后，就是党内和群众运动对刘少奇一步步地进行批判。刘少奇被认为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1月13号，他与毛泽东见了最后一面。他对毛讲要辞去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席这三个职称，然后离开北京到延安或者到老家去种地。他希望能自己来承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以便尽早结束运动，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但是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要他好好读书、保重身体，也没有同意他回老家或延安，还是让他待在中南海。

此后，中南海里组织起来的国家干部造反派们对刘少奇批斗了六次。7月8号的第五次批斗，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拉出去批斗的时候，刘少奇对王光美就说了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次批判之后就把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开了，以后他们再也没见面，所以刘少奇这句话更像是讲给王光美的遗言。8月5号是第六次批斗，批斗后刘少奇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跟工作人员说要向中央报告他的想法。他拿着宪法说：“我还是国家主席，是吧？要是我还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如果要审判就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国家主席是人民代表大会人大选举出来。就我个人来讲，我还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刘少奇实际上问的是宪法还有没有作用，但是没人理睬他这个问题。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在文革中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有97个中央委员，到这时候有一些生病去世了，还有很大一部分都被打倒了，政治上没有重大问题的中央委员还剩四十个，人数不到一半不能开中央全会。八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是98个，这时候政治上没有问题并能够参加的只有19个人，就从19个人中挑选了10个。一般来说，候补中央委员替补成中央委员应该根据选举时的得票，不是根据政治表现，但这时直接从中间挑了10个补进中央委员，加上四十个，一共五十个，正好超过97个半数，就可以开会。

这次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会上当然通过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上写到，中央专案组的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对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是中共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给刘少奇定了一个调子，就是三顶帽子：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这个都是诬陷啊！

1968年与1945年党中央对刘少奇的评判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时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要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当时公报说是一致通过决议，但事实上并不是。全会上是举手表决通过决议，还不是按表决器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五十个人中有一位中央委员了不得，没有举手，所以说并不是一致通过。

这个了不得的人叫陈少敏，也是早年就参加革命，是个非常传奇的党内豪杰。这次会议中，包括小组讨论、最后表决，她就是死活不举手。最后会议的简报中说她政治觉悟还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婆，因为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我们想想看这么一个中央委员和另外49个，这49个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等，都举手，都一致同意把刘永远开除出党。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历史书写，1比49，少数才是正确的。

这以后刘少奇命运很悲惨，整个决议通过之前都没有和他有任何的交流和核实，1969年10月，他被转移到开封，这时刘少奇已经生病，病得很重，一个月不到，11月12号，他就在开封悲惨去世。去世时，在开封看管他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他用了一个化名。

这实际上是党内一个政治冤案。文革结束后，党内高层从1978年就开始对所谓刘少奇是叛徒、内奸的这些事情进行重新审查，然后尽快公布结果。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平反的决议，认为刘少奇事件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些人耍的阴谋，利用了文革中间的错误，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迫害。这个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三顶帽子，以及撤销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等名誉。这是第三次党中央的官方评判，中央全会的决议给刘少奇恢复了名誉。

从1945年的历史决议，到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审查报告，再到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平反和全会公报，刘少奇从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再回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整个评价的褒贬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80年的决议推翻了68年所有的不实之词，中国共产党给了自己领导人应有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历史书写与政治的关联。这三次不同的评价或者说历史的记录、历史的书写，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的，那么这是不是刘少奇所希望的人民的书写呢？

刘少奇在最后一次被批斗，就是67年的八月份被批斗以后，他问了两个问题：谁罢免了我，作为国家主席的职位谁罢免了我？我作为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宪法会成为一纸空文？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样不正常的事情？这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可以看到，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平反决议和全会公报没有回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不断进步与时俱进的。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一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党有两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第二个。在这个决议中间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刘少奇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读这一段给大家听。

在这十年中（1957到1966年），“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到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为什么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因为文革的发生。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以及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决议同时提到，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刘少奇是党中央的重要成员，是第二号人物，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导致刘少奇个人悲剧在内的整个国家的悲剧中间，刘少奇自己也是有责任的，他自己也未能及时纠正。但是这还并不仅仅是没有能及时的纠正，有些毛泽东犯的错误，刘少奇是参与其中的，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

对毛的个人崇拜，那一代领导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刘少奇、周恩来，更不要说林彪，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制造了对毛的个人崇拜。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地，毛凌驾于整个中央之上了，最终延安圆桌会议体制瓦解了。

阶级斗争的错误实践，刘少奇也参与了。庐山会议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发展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当时刘少奇也参与到对彭德怀的批斗中，他同意毛主席讲的彭德怀是有野心的，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这是根本的问题。打到彭的时候，党内还有一部分人包括彭的部下表示不满和想不通。但阶级斗争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到打倒刘的时候中央就只有陈少敏一人了。

刘在第四次批斗后，说不要再抱幻想了，要做最坏的准备。包括他的最后一问，是否是对自己以往未能积极纠正错误的反思呢？是否就是他期待的人民的书写呢？这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如何通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来解读历史人物这个开头的问题。我想讲三点。

第一，通过中央在不同时期的三个文件对刘少奇的不同评价，我们知道与政治关联的历史书写会随着政治的变化和历史的进程发生变化。执政党的历史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所以不要相信“永远”，像刘少奇在1968年被永远开除出党了，但最终在1980年还是平反了。执政党的认识随着历史的进程也在向前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也是课前有同学提的问题。

第二，我们讲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强调的是人民史观，不是帝王史观、不是英雄史观，不是某一个群体的史观。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书写的传统，有史官的传统，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史，所谓二十四史。我们习惯的官方的史书中，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但是我们今天来评价汉武帝、唐太宗，我们不会照搬汉书或者新旧唐书中的结论，后来的史家不会从刘家、李家的立场和视角来解读汉朝唐朝的历史，因为完全摆脱了官家，摆脱了一姓，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人民的史观。

第三，因为人民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群体，作为人民的历史书写，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历史本身除了专业的史家，一般的大众能不能参与？当然能够参与。我讲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垄断历史的书写。如果垄断也是短暂的、不长久的，就像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暂时垄断了历史解释权，给刘少奇带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好像是板上钉钉了，永远开除出党了。但是，12年的时间就完全平反了，现在都认为那完全是诬陷。因为历史是一个公共的话题，我们允许众声喧哗，允许有不同的声音。所以众声喧哗的合唱就是人民的属性。我们常常说历史是无情的，但道是无情却有情，因为不断的书写延续下来的话，慢慢地就会越来越贴近历史真实的面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那你就不可

能找到历史的真相。所以我们讲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也意味着，历史书写不应该是定于一尊、只有一种解释的。

最后我想用悲惨世界音乐剧中的歌名‘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来结束这个讲座。接下来我们大家可以开始互相交流，谢谢。

#### ◇ 互动环节

Q：历史是不是一直以来被工具化，试错成本太高，就是“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A：确实是说历史被工具化有这种现象。但是作为历史学者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恢复历史学本来的面目。它是一门学问，当然不能说和科学完全一样，因为科学可以不断地实验试错，历史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当然在现实的社会中有时确实还很难做到。

也有同学问，是不是好像看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大家都不去接受教训，对今人来说，读历史还有没有用？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教训都没有被后人很好的汲取。德意志民族对出现希特勒这么一个独裁者的历史教训他们就很好的汲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希特勒、戈培尔这样的人，在德国再也不可能出现了，这是德意志民族从历史汲取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我们说历史教训还是看你怎么去汲取它，我们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怎么看公共史学对促进人文历史认识的意义？它对历史学走出象牙塔和公众去沟通确实非常重要。我自己也对公众史学也有很大的兴趣，也做过一些相关工作。现在公众史学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舆论空间不够，尤其我们当代史要做些公共史学的工作，有较多的制约。比如说上海电视台的纪实频道以前有一个栏目叫往事，主要做的是共和国的历史，我帮他们一起策划过一些选题，也做过他们的访谈嘉宾。但这个栏目现在就没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第二个问题，公众教育中间，尤其面临当代历史，大家会碰到非常尖锐、对立的争执。如果碰到这种争议的话，大家应该站在一个求真的基础上。我借用一个学者的话，我们只认事实，不讲道理。比如说对刘少奇的评价，他是叛徒吗？拿证据出来。不是叛徒，这个问题就放到一边去，就不要来争。那么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是好还是坏？我们先不讲。他批判过吗？批判过，就讲事实。然后事实明白以后的评价怎么样，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他可以保留他的看法。我们不要强求只有一种看法。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Q：历史应该为政治服务吗？应该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吗？

A：我想我在给我们历史系的本科生上当代中国史这一学术专业课的时候，这个问题我都要讲。在历史系我上的是整个中国通史的最后一段，叫中国近现代史（下）或者叫中国当代史，从1949年讲到八零年代，时间最短，三十年。我是把它作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来讲，我遵循的是古代史老师、近代史老师讲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失去了真实，历史学没有存在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教育首先应该强调史学的本质，就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相，只有真相追求到了你才能接近真理，否则任何的所谓的真理，没有真相支撑，它就不能叫真理。作为我们现在通常会说的政治教育，历史有政治的功能，我也不否认。因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不管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当代的，都会希望巩固统治。但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的工作者，我会清楚的知道历史学者应该做什么。这个是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从司马迁开始就为我们树立的榜样。

Q：人民史观是否只是一种理想？我们看见随着时间流逝，真相逐渐被挖掘，但这或许不过是权力转移，亦不再是相关的结果。历史是否本质上还是由当权者唆使？

A：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用后现代的理论来说，这个当权就不仅仅是政治当权者，有文化权力的人也是当权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书写都是权力的运用。但从历史长河来看，最后就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肯定是符合人民大众的东西，因为人心都有一个基本的向真向善的倾向，所以最后留下的肯定是经受了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历史叙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说人民史观不仅仅是一种理想。

当然人民史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牵涉到如何来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是你自己站在什么样的视野上。你可以站在帝王，或者站在国家，或者站在某一个群体的立场上来看一些事情。你可以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比如说大跃进，我们有这样的评价，认为这个是中国工业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为我们现在的经济腾飞打下了一个基础。

但是如果站在人民史观，我是不认同这种说法的。任何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权，谁可以做谁的代价？我们的父辈们经历过大大跃进以后的困难时期，饥荒死去的人可以成为我们这一代幸福生活的代价吗？如果不可以，那这些丧失的生命，我们就要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就是人民史观。如果你从国家史观，你可以说这是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代价。所以我们强调人民史观实际上强调的就是从百姓的立场来看历史。

Q：刚刚讲过历史的教训，其实就是从来不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发展中各种遗忘的竞争？如何看待低级的声音总是被当时主流的声音压制的这种现象？

A：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刚才就讲不完全是这样，像德意志民族，他们汲取了。当然我们没有做好，但是这是整个民族的事情，大家都要做，你一份我一份，大家都来做，慢慢地我想还是能够做到。

如何看待遗忘的声音？现在说话的手段很多，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发掘那些被遗忘的声音。比如说有一个美国的学者贺萧，她在陕西找了很多妇女，因为我们的历史书写中间很多是男性书写的，是有权的人书写的。那些无权的妇女在历史上没声音，然后她就曾到陕西做了很多很多人的口述，然后又根据她们的口述，记下那些有文化的或者文盲的妇女记忆中的农村合作化的进程。她的这本书叫《记忆的性别》。对于遗忘，大家要一起努力，历史学家更要努力把这工作去做好。

Q：应该怎么看待没有唯一的真相，只有多元的真相？

A：所谓历史的真相，有几个层面。比如说一般的具体的史实，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城楼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事情不存在多元的角度，当然如何来描写可以有不同的描写，但是那天的事实是存在的。历史中间还是有一点基本的事实是客观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认识，因为现在很多的所谓后现代的解释都讲，说是一旦你使用语言了，就没有客观性了等等。我是认为一些基本的史实还是有的。刘少奇诞生于1898年，逝世于1969年，这个都是事实，无所谓多元的真相，只有一个真相。

如果碰到一些涉及如何解释的事实，比如刘少奇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打倒，那就有多元的叙述。一些简单的事实，它就是存在的事实：哪一天发生的战争？哪一天谁死了？哪一天谁夺取了政权？至于他怎么夺取政权的，他是靠卑鄙的手段还是高尚的手段等等，那就存在着你站在哪一个视角来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对真相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

Q：历史应该为政治服务吗？应该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吗？



A：基础史料的话，讲座前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就说，他要了解周恩来，他先看年谱，然后再看传，他认为是不是先看年谱比先看传好。年谱是以史料编撰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一旦经过编纂了，又经过裁剪，它展现的事实就是经过裁剪的事实，已经带有主观的判断了。

比如说周恩来的年谱，他所有提供的事实绝对全是真实的，但是这里面展现出来的周恩来，就是100%的周恩来吗？不对。他大概给你展示了80%，有的地方给你展示了50%。如果你把50%看成100%，那你的理解就有错了。所以我刚才讲的历史真相，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要注意那些官方编撰的史料包括有些史家编的史料等等，都是编撰过的，所以我们阅读时要谨慎。

关于基础史料的话，比如说如果大家了解毛泽东时代的话，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12卷，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大家可以看看。如果不是历史专业的话，量就大了一点。讲到好点的著作的话，我们下次推荐。如果大家要了解文化大革命，我比较推荐麦克法夸尔和迈克写的那本《毛的最后革命》，在香港和台湾都有译本，我自己也有英文本，这是讲文革的历史比较好的一本书。如果是讲整个毛时代比较精练的一本书，应该是去年出版的魏昂德的《脱轨的革命》。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不太厚，大家比较容易读。

金老师：我最后再讲一句，看到同学们的提问，我非常开心。我感到复旦的学生不愧是复旦的学生，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谢谢大家！

□ 来源：复旦大学“星空沙龙讲座”

~~~~~

【史海钩沉】

为领袖出书的文革十年

· 陈徒手 ·

◇ 01

1966、67年“文革”运动如火如荼，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对毛著的需求变得格外迫切。据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业务组统计，1967年全年之中，《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32开本平装本，每卷付印数高达330万，《毛主席语录》64开本精装付印数250万，《毛主席语录》64开本平装付印数30万，《毛主席语录》100开本精装付印数109万，《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32开平装付印数50万，《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32开平装付印数30万，《毛主席诗词》100开精装付印数30万，《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毛主席的五篇著作》128开本精装付印数各30万，《毛主席诗词歌曲集》64开本平装付印数50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64开本平装付印数100万，《毛主席论教育革命》32开本平装付印数270万，而《老三篇》64开本平装付印数高达1000万，各种开张的毛主席语录张贴画付印数则达1105万。（见1968年1月《毛主席著作出版统计表（1967年1—12月）》）

1968年11月27日，市二轻局革命领导小组自豪地宣布，北京东风制革厂革命职工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的红心，用很短的时间敬制出性能良好的红宝书封面革，耐磨度可达三千次，在零下三十度不变质，不脱色。这一年已赶制出22万册，1969年继续发扬冲天干劲，安排敬制红宝书封面革一百万册。

各地出版局在“文革”初期被撤销，后以“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名义重新组建，成立初始主要负责毛泽东著作的出版事宜。一些单位的人员嫌其名称过长，常简称为“毛办”或“毛著办”，1969年12月23日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专门发出通知，批评使用简称非常不严肃，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今后不论书面还是口头，一律用“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全称，不能简称。由此以后数年，官方在行文和讲话中都严格执行这个内部规定。

从1969年开始，直属于北京市革委会的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全力维护印刷机器设备和厂房维修，保证领袖著作及时、安全地开印。1969年1月28日它向市革委会政治组、计划组请示称，由于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对毛泽东思想，限制毛主席红宝书的敬印，多年来我们的设备更新和厂房维修工作都未能适当解决。现有机器设备大多陈旧，需要交替地进行修理，危险房屋多系年久失修，并经房管局鉴定，确实急需进行大修。报告中说，印刷机不能配套或缺乏大型机器，影响敬印毛主席著作1至4卷合订本、全开纸毛主席画像，仍然不能满足目前大印特印毛主席著作的政治任务，影响革命人民的需要。因此，申请专用设备28项，抢修危险厂房五千多平方米，共需上级拨款212万元。报告最后还提到，需用20万元购进全张二周转印刷机5台，敬印毛主席红宝书四卷合订本，再拨72万元，购置全张自动双色胶印机、对开自动双色胶印机各2台，敬印毛主席正面像。

这种不断报来的申请拨款报告，市里百分之百要批准通过的，而且丝毫不敢怠慢。2月13日，申请拨款的请示报告首先称，“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敬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传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请示拨款16万元，为新到的折页机、裁纸机、配页机等七台机器付款；3月28日，申请报告的理由是“为了保证高质量地出版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光辉形象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里尽快拨款43.6万元，以便付清中央分配来的自动胶印机2台、自动打样机1台、全张裁纸机2台；4月23日，要求市革委会计划组批给基建面积9890平方米，其中力保的胶印厂制版车间的面积3500平方米，投资124.5万元，为的是“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主席著作出版”。

1969年初国内几家工厂对外称“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打破了洋框框”，试制出敬印毛主席红宝书封面用的电化铝。3月20日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领导小组当即发出通知，今后不再进口电化铝，要立足使用国产品。这本是自力更生的举措，但没想到北京市印刷企业反而申请添置真空镀膜机、涂布机、复卷机等五台，需上级投资19万元，以便与国产小批量的电化铝匹配。而北京印刷四厂全张照相制版设备不配套，缺全张网目版一块，此产品国内不能生产，为了“更好地敬印毛主席画像”，10月30日只好向市革委会计划组申请进口一块日本产的全张玻璃网目版，费用是300美元。

出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战备需要，市里拟在远郊县另觅新地，外迁部分印刷能力。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只有运输纸张材料的卡车两辆和修复不好的美式吉普车一辆，10月28日特地向市革委会政治组、宣传组、计划组申请北京牌吉普汽车一辆，便于与远郊县联系，“解决路途遥远之不便”。

◇ 02

据1970年1月19日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领导小组上报的《1969年工业企业统计年报》，1969年全市《毛泽东选集》普及本出版246万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40万册，《毛主席语录》685万。这样就始终保持“文革”以来发行的高峰态势，光是北京印刷一厂就合计印行庞大的408万册。

就在1969年7月，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连续发出两件通知，要求“为了确保毛主席著作的质量”，将封存在书店、印刷厂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普及本54万册、精装本7万册，《毛主席著作选读》甲、乙本及未经删改注解的单篇本496万册，全部收回，以保密件送造纸厂化浆销毁。同时，《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需换页处理，涉及到册数高达141万。有人大致估算，北京市销毁这批图书的费用及换页加工费共计117万元，需市里迅速拨款。

上级通知中没有明确说明这几百万册图书化浆销毁的理由，但1970年7月14日外文书店上报停售书画的报告中，其中提到1966年出版的64开大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现存61·1万册，计37·3万元，因第二十四节第七段“引用大叛徒刘少奇的一段话”急需处理。因存放时间过久，这批图书的塑料皮已发硬变质。报告中不敢说销毁化浆，委婉用了“收回加工改制”的说法。

1970年继续向市里讨要费用，名目变为“传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热烈地迎接《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敬印的政治任务”。1月3日递上请示报告，鉴于印刷机器陈旧，运输工具紧张，需增添卡车8辆、机床15台，申请用款49万元，并翻建危险厂房面积5100平米，请拨款51万元；5月29日申请报告中称，市印刷五厂铅印能力很小，仅有六台能印书刊的机器，很不适应敬印毛主席著作的需要，请给予解决投资款25万元，接受中央分配来的2台单面轮转印刷机及附属设备。

1972年8月3日，市出版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致函外贸部，坦承北京市属印刷单位的胶印机器设备大多是陈旧的，精密度很差，严重影响着产品质量，不能完成敬印伟人像和出口宣传画册、商标等印刷任务，请外贸部可否将库存现有的对开双色胶印机调给北京三台。报告中显示几分急切：“目前北京需要极迫，恳求给以大力支持，帮助解决。”8月25日再致函市革委会文教组，再三说明“胶印的能力比较薄弱，需要增加设备”，但固定资产更新基金提取数额小，“主要生产设备无力购置，生产上又很需要胶印机”，能否从文教口未开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中调剂解决，希望得到三台对开双色自动胶印机，合计33万元。

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中国人民银行崇文区办事处开有户头，帐户为80209号。1970年9月7日，致信人民银行崇文区工业信贷部，要求根据中央财政部的文件精神免计全部贷款利息，因为“我处贷款完全是为了出版毛主席著作所需储备的纸张、塑料、油墨等各种材料而贷款的”。

申请贷款免息的政策理由是印制毛泽东著作，但实际到了1972年，印行毛泽东著作的种类、数量却大幅度地下降，其他政治读物、文学艺术、中小学课本、图片等发行数大量上升。据1972年4月30日《一九七二年第一季度出版情况汇报》，1972年第一季度北京共计出版一百另二种、一千五百八十四万六千（张），其中毛主席著作只有一种《毛主席论文艺》，五万册；毛主席像五十八万张，毛主席语录（单张22条）十九万三千二百张；1972年7月26日上报《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出版情况汇总表说明》，报告中说1972年上半年共出版书画一百四十七种，二千二百七十七万零三百册，其中含糊地表示，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有八种、一百零五万册，毛主席像和语录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张。

此时，“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名称已缩减为“出版办公室”或“出版办公室领导小组”。在1972年10月14日《一九七二年第三季度出版统计说明》中，第三季度共出版书、画一百另二种，一千六百零七万册，其中马列著作八种，一百二十三万册；政治读

物十三种，一百零六万册。此时已经没有毛著及单行本的印行数，再也没有出现“文革”初期几年的毛著出版巅峰状态，大量印行的是文学、文化教育、科技、中小学课本、连环画及画片，譬如小说《春到凤凰岭》印数67万册、《激战无名川》10万册，《容易读错的字》《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各发行到105万册，《人怎样战胜传染病》72万册，《电视》69万册，《广播讲座英语》50万册，连环画《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列宁在191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各20万册，这些书籍风靡一时，逐渐形成新的读书热点。

### ◇ 03

1970年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曾下达第六号文件，明确要求北京市为以后印行的《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普及本专用纸储存52克古版纸3180吨、五、六卷精装本专用纸储存30—35克古版纸456吨，五、六卷及毛主席语录新版本用的封面、像页、扉页等储存胶版纸300吨。后来国务院出版口一再指示，专用纸不准挪用，并要求储存保管好，为《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从1970年起，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的内部信息一直不断，储存专用纸成了出版部门的刚性规定。但储存量如此之大，保管时间如此之长，给仓库方面增添不少困扰，几年间为此来回磨合、腾挪。1973年市物资局仓储公司不时来函反映困难情况，出版办公室回复多有安慰之意。

最麻烦的是，由于用纸紧张，迫不得已，不时挪用了《毛泽东选集》新卷本的储备纸。1973年6月28日，市出版办公室致函国务院出版口，汇报说北京市中小学今秋、明春两季课本正在陆续发印，用纸量将达1600余吨，广播英语、北京少年等期刊每期印数都比原计划增加，由于纸厂和租赁仓库等原因，少入库纸几百吨，这样就给今年用纸带来一定困难。为此不得不动用《毛泽东选集》新卷本的储备纸，特申请今年增拨卷筒纸300吨，以便补充专项储备纸。

1975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排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小三十二开本的通知，鉴于两个选集各5万套用纸均由各地自筹解决，各地出版部门纷纷来信叫苦不迭，国家出版局只好委婉同意酌量动用《毛泽东选集》储备纸，但需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报告，动用数量请函告国家出版局备案。国家出版局同时还严令，其他图书用纸不适用此例，不要动用此项储备纸。

1976年度国家分配北京市出版用纸5334吨，其中本应由北京造纸总厂供应的52克凸版纸4321吨，但到了5月只交920吨，尚欠3400吨。一查原因，说是原材料液碱等供应不足，天津造纸厂所供本色纸浆生产的纸白度和尘埃等都未达到规定标准，不能供应所需52克凸版纸，市出版办公室与一轻局、造纸厂多方协商仍未能解决，这样势必严重影响出版用纸，5月27日只能向市文卫组、市计委打紧急报告，要求再动用毛选五、六卷储备纸700吨，这部分储备纸已存放四年多，根据质量要求需要轮换，需要新生产的52克凸版纸做补充。

在这同时，市出版办公室派人核实，发现在东郊百子湾库、怀柔501库、清河库、房山南观库四处实存毛选特种储备纸2530吨，其中毛选储备用红封面纸105吨，该纸是1967年专门试制的，已存十年左右，以后未生产，无法在一般出版物中使用，因此无法轮换；怀柔501战备库存有储备纸53吨，已存十年以上，因库房无站台，离城区140里，路程较远，运输不好解决，至今也未能使用；百子湾库存毛选合订本储备薄凸版纸43

3吨，已存放八年左右。（见市出版办公室1976年7月14日致市文卫组、市计委《关于我室在物资局储运公司存纸情况的汇报》）出版办公室希望尽快用掉其中存放时间较长的凸版纸1200吨，但苦于造纸厂生产不正常，未能及时补充存量。

市物资局储运公司1976年6月5日致市计委的《关于出版社存纸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北京出版社累年积压纸张库存3741吨，占库房八栋，约8000平方米，其中进库后10年以上未动的102吨，5年以上的742吨，4年内的2837吨。报告甚至描述道：“有些纸张由于多年不动，从表面看来已发脆发黄，工人对此很有意见。”鉴于百子湾仓库长期被纸张占用不能腾出库房，大量纯货进不去库，影响周转使用率，储运公司提出1976年为了解决化工产品、水泥、玻璃储存问题，百子湾仓库不再存纸张，余存纸张仅出不入，需入库的纸张转至清河仓库及山区库。

涉及将来印行毛选五六卷的储备纸，市里领导对此不知所措，转发一圈只是传阅，连负责文教的市革委会副主任黄作珍都不好下决定，还是推到市委文卫组审阅。

#### ◇ 04

为了满足中央首长读书的视力之需，1973年起中央有关部门开始下达印制大字本的政治任务，市新华印刷厂、印刷一厂等成立专门的大字本车间，配制特有的印刷设备。1976年7月21日，印刷一厂革委会负责人在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披露，几年来该厂共印制大字本98种，1140万字，还多次承担突击性的政治任务。

1974年初，印刷一厂接到为中央印制一种大字本的政治任务，当时经过管理部门的测算和安排，需要十五天才能出书，出版领导部门要求在一周之内完成。没想到，上级又及时地传达毛主席的声音：“请你们和工人同志商量一下，三五天能不能看到书。”据厂革委会发言材料介绍，厂里立即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话语之后，与会者都激动地流出了幸福的热泪，纷纷表示任务再重，时间再紧，困难再大，我们也要让毛主席提前看到书。大家说到做到，经过大家日夜奋战，五十两个小时就把书送到毛主席手中。

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批示发表后，1975年印刷一厂接到中央交办的印制大字本《水浒》的政治任务，当时36磅半体字大字本车间正在筹建，正文用字和铅空材料还有一部分没有铸齐，同时由于字号大，铸字产量低，出现铸字设备不能满足排版用字的需要。但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水浒》大字本立即投产，限时完成，这样按照全书出书的日程，排字必须保持日产三万字。

厂党委把遇到的困难向群众讲清楚，大家讨论后决定挖掘设备潜力，把报废多年的汤母森铸字机从仓库里挖了出来，修旧利废，使其重新投产，解决由于铸字设备不够、影响排版供字的矛盾。同时挖掘人的潜力，采取一人多机和三班活两班干的方法，破解人手不够的难题。这样原计划40天完成的《水浒》大字书，实际只用了30天就上交中央部门，这种苦干巧干的精神也促进大字本车间的筹建工作，这个特殊的车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一个月上马。

刚开始印大字本，是用小机器印制，产量低，时间慢，劳动强度大。为了让中央首长早日看到大字书，书版车间的职工见状后主动提出用大机器印刷，但又遇到纸张废率高、上版时间长的问題。大家在现场找原因，发现纸张作废率高是因为纸张潮湿，伸缩性大，影响套印，还有就是印格版的机台和套印正文版的机台操作不统一，续纸技术不熟练造成的。于是众人在开印前先铺开纸张晾干，排除潮湿，同时积极操练基本功，改进压纸器续纸程序，使

纸张的作废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五十，降低到百分之十以下。至于上版时间长的难题，大家提出机下刷版检查坏字、边条刨糟不解版绳、用铁档代替铁框等十几项措施，大大压缩上版时间，由原来的每班只能上四次版，提高平均每班达到二十版，提高工效五倍。

新华印刷厂革委会负责人在7月21日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发言中，自豪地声称大字本车间和其他生产车间上半年共完成急密件等政治任务38种24万册，特别是出色地完成国家出版局安排再版毛主席著作单行本57种的任务。譬如活版车间承担了116种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排版制型任务，发动群众连续一周三班突击铸字，提前十天满足了排字的进程需求。纸型工段工人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的作风，也提前十天完成57种单行本的制型任务。轮转车间为了保证在新机器上印制好毛主席著作，操作时努力做到版垫得平，墨色符合要求，页码经常检查，印刷质量一直保持较好的水平。

引人注目的大字本车间本来是为中央首长印制大字本的，在设备、技术上存在着不全的问题。但他们听到承担印装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任务困难较大，“广大读者迫切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主动提出除了保证大字本任务外，承担6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任务。

新华印刷厂领导在发言中坦承，印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的过程中，虽然做了层层动员和具体安排，由于检查不细，事前对四号字模能否排印毛主席著作了解不够，因此在重排四号字时发生较多的歪字，只好返工重排，造成政治上很大的影响，经济上很大的损失。在排印《唐诗三百首》大字本任务中，由于工艺不细，以致印出的成品不合格，只好返工重印。这位负责人带着检讨的态度说，这些都说明我们生产管理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改进。

◇ 05

1974年5月，负责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做出批示：需要印制少数的二十四史大字线装书。姚没有明说原因，但知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批特殊的线装书主要是要供视力减弱的高龄中央领导阅读，在时间、质量上要切实得到保证。在这之后的一年内，国家出版局全力督促二十四史大字线装书的印制工作，1975年5月9日专门向姚文元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汇报说现在北京、上海、天津扩建的四个排印大字线装书车间将陆续投产，北京印刷一厂和天津市的专用车间可在7月份投产。

国家出版局在报告中称，中华书局承担《史记》《汉书》《晋书》等十三史和《清史稿》，承包了近一半的任务，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唐书》《新唐书》《五代史》等五史，天津人民出版社承担《后汉书》《三国志》《南史》等六史。现已出版了十六史，其它八个史正在排印中。最大的难度在于，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总共约五千三百万字，排印工作量超出常规。而数量上只印一百五十部，按历来呈送数，预计给中央五十部，其余一百部拟由新华书店按定价分配给全国省级以上图书馆和主要文科、综合大学各一部，国家出版局保存十多部备用。

为了保证出书质量，使京、津、沪三地分印的线装书能装配成套，中华书局事先对选用的材料以及版式规格都作了统一规定，尤其确定字体用三十六磅大字，开本和以往送中央的线装书相同。后来中央经常临时交办大字线装书的印制任务，而且往往都是急需，基本上是照着三十六磅大字体排版的。

由于急密件、大字本等任务日益增多，新华印刷厂活版车间的存铅量已高达450吨，大大超过车间楼房设计所规定的每平方米750公斤负重，实际局部地方每平方米已达3吨

多。这使得楼面已见有裂缝，有的窗框已压弯变形，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新华印刷厂革委会1975年12月29日紧急上呈处理报告，希望将该车间存铅量大、震动较大的两工段搬到铅印工段，可以减少100—120吨铅的压力，以此保证大字本印制工作的安全和牢靠。

1976年1月初国家出版局在湖北丹江召开印刷字模生产座谈会，据1月14日《会议纪要》介绍，现在全国三大字模厂的年产量比“文革”前提高四倍，正朝着全部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特别是这两年重点完成中央交办的大字本线装书用的大号字模共九种字体、44付、33万多个字模的光荣任务，同时还完成中央领导机关交办的四付小二号专用字模的任务。

1976年3月初，国家出版局邀请上海、天津、北京三地承担中央交办大字线装本任务的出版、印刷单位负责人开了四天会，讨论字模生产、字架配备、收费办法、节约纸张以及工作进度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经请示中央领导同意，以后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正文改用一号长仿宋字，注文改用二号长仿宋字排印，统一制作字模。目录、标题、中缝字等，用各印刷厂现有字模。以前各厂用36P宋体排印的部分二十四史铅版和书页，因改排字体后不能再使用的，其工本费由三地出版社开列清单向国家出版局报销。

3月9日国家出版局下发《关于做好中央交办大字线装本排印工作的几点意见》，附有印发二十四史的版式说明书，要求各地大字本车间遵循执行。同时提及制作一号、二号长仿宋字模，工作量繁重，字模厂和制版厂要争取按时和提前完成生产字模任务，力争在5月开始用新字排二十四史。新制字模版七千多块，由北京制版厂于2月27日完成；雕刻一号、二号长仿宋字模各一付，由北京新华字模厂于3月底前完成。出版局还规定，各地大字本车间的一号、二号长仿宋字架要繁体字、简化字两种都配备，原用36部宋体字也要保留必要的简化字字架。北京新华印刷厂还要保留一、二副繁体字字架，以备承担中央交办的其它大字书刊用。

国家出版局表示，新制字模版、雕刻字模、片模的所有费用，由他们统一负责解决。只是要求各地大字本车间要更快地达到原设计的生产能力，完成向中央承诺的1977年底全部出版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的任务。印刷大字线装书需使用毛边纸，原纸需经过严格挑选，不合格的纸品约占百分之三十，挑选后纸张加放率为百分之四十。纸张如何节约，成了一个敏感的难题，出版局建议出版社可暂按一定的使用数发给印刷厂纸张，只是要求印刷厂努力降低纸张损耗，提高纸张使用率。同时确定内部价格，按古籍书排版收费加百分之十计算，大字线装书排版双面装千字单价五元二角，单面装千字单价四元三角，普通装千字单价三元五角。

不到一个月，3月31日市出版办公室向市计委报送第二季度工业生产计划，里面提及要执行国家出版局最新通知精神，大字线装书排版收费由过去折32开页每面2·80元，调整为2·00元，降低收费28%；印刷收费由每令纸15元，调整为10·40元，降低收费31%。这样预计全年影响工业总产值60万元，其中第二季度影响20万元。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之后，市出版办公室查看所属企业的震后灾情，发现印刷一厂、新华印刷厂两个大字本车间均为1975年底竣工，这次震后都发现有裂纹，但不影响使用。8月6日印刷一厂党委汇报生产恢复的情况，称主要车间出勤都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印大字本的机台大部分台次都能达到印10版以上，达到全厂印大字本的高产水平。而且在车间外设立了观察哨，设专人值班，做到及时报警，及时疏散。

延至1978年初，北京市课本用纸出现776吨的缺口，开办广播教学、电视大学之后，更加重社会上对广播和函授教材的迫切要求，全年至少需1000吨纸。而此时北京市造纸厂缺乏原料（原油）和电力不足，已陷于停产的状态。国家出版局又下达指示，要求北京市先储备《毛泽东选集》六卷1100吨专用纸，应由北京市造纸厂提前生产交出版社储存。市出版办公室1月20日紧急打报告给市委文化出版部、市计委，要求上级急速研究解决。

十年来，纸张的紧缺，一直困扰着领袖著作及读物的出版，跌宕起伏。但好在有惊无险，在政治热潮之中，出版印刷部门通力合作，保证政治著作和为领袖服务的出版工作顺利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十年高层政治与出版行业相关联的运行轨迹。

〔作者简介：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北京青年报》副刊工作。〕

□ 原载《随笔》2020年第二期

~~~~~

### 【亲历者言】

####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三）

• 阎长贵 •

（上接zk2004d）

#### 六、江青在文革初期大红大紫

对江青当时的地位问题，谈谈我的看法，也顺便谈谈文革中对江青的宣传。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是江青正处于“众星捧月”、“大红大紫”的时候。1966—67年，江青虽然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她已被列入中央负责人行列，并且排位很靠前，往往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就舆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来讲，除了毛泽东、林彪，恐怕就是江青了。毛泽东和林彪本来就是党和国家法定的一、二把手，而江青没有这个名份。因而对她的宣传就显得格外突出。

十年文革中，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从1966年到1967年，宣传江青对京剧改革和“文艺革命”的作用和贡献；第二次，从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诬陷、打倒的事件）开始，大讲江青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等口号；第三次，是七十年代林彪折戟沉沙后，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大力宣传江青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把江青塑造成反林英雄。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明显的高潮。

我担任江青秘书那一年，正是你说的第一次宣传江青高潮的时间，我身临其境，谈谈当时的情况。

首先是江青政治地位的变化。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名列候补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之前。

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宣布：“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当时，在中央文革中，掌控大权的是江青，人称“江青专政”。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这时，江青在党内、军内都有了实际职务，而且是很高的职务。

当时在政府内，江青还没担任什么职务。据曾志说，陶铸曾和周总理商量，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江青听了此议气得要命，说“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在当时，江青甚至会认为，这是陶铸对她的贬损。江青当时的地位确实非常显赫了，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有人说，江青的“第一夫人”的含金量甚至重于她后来担任的政治局委员，这是一点不假的。

我印象中，当时不仅中央文革一般成员吹捧江青，而且陈伯达、周恩来，甚至林彪都有赞扬江青的言词。

我收集了一些材料，可以念念。

林彪比较突出的是：1966年1月22日，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周恩来也宣传、赞扬江青。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周恩来说：近几年来，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是文艺工作革命化的大飞跃。又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还说，在文艺方面“感谢江青同志帮助了我”。

吹捧江青的话，陈伯达讲的最多。

他当时虽然对江青已经有所不满，但在公开场合，对江青吹捧的活却说得最多、也最肉麻。我举几个例子：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广播学院讲话，就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在驳斥一张“诽谤”江青的条子时说：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

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1966年11月28日，陈伯达在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致开幕词。他说：在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诅咒它，恨死它。……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1967年5月23日，在首都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发表讲话，其中谈到江青时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

关于康生，1966—1967年，在公开场合我没听到他对江青有什么赞扬和吹捧的话，后来我注意寻找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当时在中央负责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泽东，大概只有康生。这可能是历史形成的习惯。但我认为，这并不表明康生不尊重或者说不怕江青。虽然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远远超过和陈伯达的关系。后来他也改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给江青信的信封上，还写着：“呈江青同志亲启”。

郭老，即郭沫若对江青的吹捧最是不堪。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朗诵了他作的一首诗，说是“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专门有这样一段：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  
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着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除了这些大人物以外，我们再看看中央报刊对江青的宣传。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写道：“有一千五百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这个意思不仅在正文中，而且上了提要。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

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名字与毛、林、周并列。真是史无前例！此事也没听说毛主席对它有什么批评或异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还是有意的，是什么权威人物授意和安排？均不得而知。迄今重审这段公案仍成一个不解的谜。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是江青主持的，江青更是出尽风头。除了第二天见报外，还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大型文献片，在全国上映。一时间江青声震九州，名闻寰宇，成了举国举世瞩目的人物。群众和各方面给她的来信，如雪片飞来，多时每天达两千多封，用麻袋装。江青办信组也应运而生了，在全国多少人心目里，江青简直成了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江青办信组，开始为江青同志服务的。

到了1967年，江青热的风潮也未见减弱。1967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文艺舞台将隆重公演革命文艺节目的“新华社二十日讯”中，特别突出了江青。此“讯”写道：“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亲自关怀和支持树立起来的第一批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将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辉的姿态同观众见面。”还说：“在无产阶级自己的节日里，再度公演这批无产阶级文艺舞台上的优秀剧目，将大大鼓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干劲，大煞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威风。”

还有一件事也应该提一下。江青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一字未改，在1967年《红旗》第六期和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红旗》还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说：“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又说：“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的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

## 七、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步也没离开北京

在文革发动阶段，发动者毛泽东和参与发动者江青都不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直到1966年7月18日和7月20日，毛、江前后脚回到北京，随之刘邓主持文革的阶段也就结束。

江青回到北京后，马上就和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连不断地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学院等高校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8月初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八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12月份，江青不断接见各路造反派。这些都有充分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我是1967年1月9日任江青秘书，1968年1月9日离开的，整整一年。我可以肯定地负责任地说：那一年江青没有离开过北京一天。其后，即1968年1月以后的情况，我就知道了。这在江青随毛泽东1949年3月进北京后，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据在江青身边工作十几年的同志讲，文革前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左右。往往是每年国庆前后就到广州，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来年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唯独我当江青秘书那年例外，我也无法借她的光，乘什么专机，坐什么专列，更没有在外地住什么豪华别墅。说实在的，我参加工作五、六年了，没坐过飞机，也没到过其他大城市，心里还是

有所向往的。1967年6月份，江青身体欠佳，工作人员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休息。有一次我也这样劝她，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1967年，江青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场等处开会，会见什么人，其活动范围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她此前此后那些打扑克、养猴子、弄狗、骑马等等消遣爱好，在1967年整整一年里，我确实都没见过。在她身边工作比我长的同事，或了解江青情况的人都说，江青似乎变了个人。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编造了江青在健身房锻炼的故事（第75—76页）说：不知是刮的什么风，这天下午，江青又眉开眼笑叫小阎：“你跟我到健身房里，帮我做点事。”小阎自然知道是帮她做什么事，急忙放下手里的工作，跟着她来到健身房。这个健身房，可非同一般，它是专门给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国宾使用。足有六七十平方米大，明亮宽敞，设备豪华。双杠、单杠、吊环、台球、乒乓球……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小体育馆。张春桥早已在健身房里恭候。小阎跟着江青走进去，她打量了一下屋里的现代化设备，忽然向张春桥道：打网球去吧！“张春桥顺从地应道：“一切都听你的。”他们三人来到网球场。穿着红色紧身运动服的江青，手里紧握着网球拍，大显了身手，一蹦一跳的，打得很顺手，不时的发出一阵阵的狂笑。这可忙坏了小阎，他的任务就是给拣球。不仅给江青拣球，还要给张春桥拣球。他稍微动作慢了一点，江青就大发雷霆：“你那么年轻，怎么那样无用？连个球都拣不好，你是一个不称职的秘书。”小阎已经累得满身大汗，咬着牙，用着百米冲刺的速度，给江青拣完了球又要马不停蹄地跑到张春桥那头拣球，这等于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赛他一个人了。幸好！张春桥救了小阎，江青要显出女人胜过男人的威风，她步步紧逼，主动地发起攻势。枯干瘦小的张春桥，开始时，还能勉强应付。渐渐地就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后来，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副败将的狼狈相。他笑着向江青道：“不行啦！”他举起双手：“甘拜下风，举手投降。不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技术上，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他们说着笑着，走进休息室。跟在身后的小阎，从心里感激张春桥这个“败将”。他和江青，双方如果是棋逢对手，两强相遇，他今天就得晕倒在球场上，这种大煞风景的场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春桥帮了自己的忙，化险为夷了。他急忙跑到休息室，从热水中拿出一块拧过的毛巾，递给江青，接着递给她一杯香茶。好逞能、又取了胜的江青，特别高兴。她一边擦着手，一边冲着狼狈不堪的张春桥，得意地道：“看来你这耍笔杆子的秀才动起武来就是不行，连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都打不过，你这身体可要加强锻炼哟！没有好体力，在政治战场上，我们就无法打赢对方了。”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张春桥望望汗流浹背的小阎，同情地道：“今天把你累坏了，一个对手，我已经招架不住了，你是两个对手，真够你呛了。”小阎笑笑，没有吭声。

钓鱼台有没有这样的健身房我不知道。江青在1967年1月以前和1968年1月我被她赶走以后，她是否到过健身房，我不知道，我也没了解过。但说1967年江青带着我到健身房，纯粹是造谣。顺便指出，林青山这里编的情节是抄自一本叫做《“二月逆流”》的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6—89页），不过那里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林青山抄袭时加上去的。

关于江青的业余活动，主要是看戏、看电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个别时候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就是她叫演的，或专门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汪东兴告诉我们，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送片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

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几个人一起请来，如果没有这些人来，身边工作人员也陪她看。

有人说，江青爱看黄色电影。这不是事实。

1967年所看的片子，主要是中国片子，海外，主要是香港的，外国片子除了《红菱艳》外并不多。就内容讲，说实在话，没有什么黄色的。记得看一部叫做《广岛之恋》的外国片子，片子一开始就是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叫了一声：“谁叫我看这样的片子？！”起身就走，我们也跟着离开了。我们很担心，江青是否要耍威风，处罚人；好在这次她并没有追究。至于我离开后，江青是否经常看黄色电影？我问过后来的秘书、护士，他们都说没有。

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说我（书中称小阎），初看黄色电影时，“脸红心跳”，后来变作“黄色电影迷”，这纯属造谣污蔑。

江青常常参加中南海举办的舞会。谁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交谊舞被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取消了，但惟独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妆舞会，来陪跳的多是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有时还请著名京剧演员谭元寿、马长礼等人来清唱。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我不会跳舞，只能坐在那里看，有女青年邀我，我只能推脱，很不好意思，想学又学不会。

1967年，江青反复说她是“政治化了的人”，从她实际的表现看，确实确实像个“政治化了的人”。

有人说，《5·16通知》下发之前，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影响极大。都说高炬是江青的笔名，也有说是江青写作组的化名。

据我所知，高炬是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所署的名字。这是一个笔名，其意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后来也有人解释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火炬”。

多年来，在党史界，在文艺界，绝大多数人说“高炬”是江青的笔名、化名，或者说和江青有关。如《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68页）说：“《解放军报》8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说：“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

《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说：“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

《中国1966—风乍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5页）除了讲到“高炬（江青化名）”，还指出“高炬”的名字并非5月8日第一次出现，它写道：“4月25日，《解放军报》刊登高炬《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株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这是受到江青控制的写作人员组成的高炬——高举斗争火炬——的第一次亮相。”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15页）说：“五月八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由她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

我可以肯定地说，“高炬”和江青根本没有关系。这是真正知情人都毫不含糊地讲过这个问题。

穆欣（《光明日报》总编，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何明是关锋的笔名。……高炬的文章则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临时用了这个笔名，乃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有的书上说这是“江青的笔名”，或说这篇文章是“江青主持写的”，都不确实，当时江青还在上海，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96页）穆欣说出了事实真相。不过，我以为有两点小不明确，需要指出：一是5月8日中央尚未正式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云云，应改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二是所说“临时用了”高炬这个笔名似也不准确，如前所说，4月25日《解放军报》就发表过署名“高炬”的大批判文章。

这件事我还问过关锋，他1966年5月初就住进钓鱼台，非常清楚“高炬”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他也说“高炬”跟江青没有任何关系。

#### 八、毛主席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我当江青秘书后，见毛主席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见毛主席，可以说在什么距离都见过，看到过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的很多姿势，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啦，吸烟啦，那就不是像游行时在天安门下面只能看到毛主席向群众挥手的姿势。但是，要上前和毛主席握手和问他好，还是有顾虑的。记得在当江青秘书以前，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再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戚本禹给我一张票，我也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喜不自胜，觉得机会难得，看到毛主席，就抢着到毛主席跟前和他握手、问好。而在当了江青秘书后，不管离毛主席多近，我一次都没这样做过。

毛主席对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是很关心的。毛主席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也是我们一定要为江青服务好的最大动力。

应该指出，毛主席这话不是对我说的，是我听说的。在文革期间，江青主要住钓鱼台，有时也回到中南海丰泽园住几天。在丰泽园住的时候，有位主席的服务人员叫赵鸿安，我们是同乡，都是山东人，年龄也差不多，他告诉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讲：“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数亿人口中，有几人能直接为毛主席服务？”

但当时我没有问他，这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跟谁讲的。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才搞清楚：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主席也在那里，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地责骂服务员张素兰：“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你给我滚！”张素兰同志觉得很委屈，跑到西湖边上痛哭，周围同志怕她想不开，把她找了回来。主席的大女儿李敏把这事报告了主席。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便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值班室来了，亲切和蔼地跟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

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张素兰和在场的护士许春华，她们都是刚刚过二十岁的女孩子，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向毛主席表示：我们一定听主席的话，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毛主席说：“谢谢你们了！”从此，“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不仅成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动力，而且也成了化解为江青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郁闷和不快的宽心丸！

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来的。他们都是苦出身，不是农村贫下中农，就是城市贫民或者工人，比如护士许春华就是烈士后代、孤儿。按照当时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没有这个条件，连考虑都不会被考虑的。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当秘书、当护士、当警卫员、当其他服务人员，人人都会为有这样的机会而有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人人都是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不能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江青说谁不给她好好服务，那完全是昧着良心瞎说。

我们工作人员相互关系非常好！情如兄弟姐妹，平时有说有笑，亲密无间。更可贵的是，在工作中，我们能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相依为命。一个人受到江青的批评、斥责、处罚，大家都不好过。诚如古人所说：“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给毛泽东做过十三年卫士的李家骥说，“我们工作人员之间真是‘互相帮助’”，“有如兄弟姐妹一样的感情”（《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451页）。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嘱咐我：“有件事，你要注意一下，凡是听到你周围的人，有谁议论我什么，你都要立刻向我汇报。这也是你的一项重要任务。”（该书第29页）这纯属瞎编，江青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布置过这样的任务。据说，后来有极个别工作人员好向江青打小报告，其他工作人员对他很反感，直到今天谈起他，大家都还深恶痛绝。我们说，江青难侍候，喜怒无常，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也不是说她整天板着脸。我们工作人员都知道，她很讲究礼数，逢年过节，她见了你，要问你好，你也要注意问她好。她有时也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谈谈家常，开开玩笑。这点前面我已谈过。

关于我们工作人员相互关照爱护的事情，我先讲讲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师傅。程师傅在我们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山东莱州人，从青年时期开始学习烹饪，后在铁道部专列上任厨师，技艺精湛。从1954年起，毛主席乘专列外出时，就给毛主席做过饭，毛主席1956年在《游泳》词中说：“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这“武昌鱼”就是程师傅做的。1956年借调任毛主席厨师。他做的饭菜很合江青口味，从1961年起，专任江青厨师，一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共16年。

程师傅对我们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大家对他都很尊敬。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吃，并很爱吃；而老母鸡的肉她不吃，只喝汤。江青有时让程师傅把鸡肉卖给大食堂；有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多次吃过，这在生活水准很低的六十年代是很不错的享受。像对待老大哥，我们心里有什么话也愿意和程师傅说。

有一次江青正在准备午睡，我收到一份急件，就马上送给她看，希望她能在午睡前看一下，以便急速下传。当我走进她卧室，看到护士正帮她脱衣准备睡觉，我说：“江青同志，有份急件请您看看。”她张口就厉声斥责我：“我正要睡觉，你进来干什么？”我不敢辩解，也不敢立即退出，过了一会儿，她又生气地说：“你放下吧！”我放下文件马上走开，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程师傅，程师傅跟我说：“老太婆了，别管她！”那年，江青53岁，比我母亲的年龄还大呢。像这样的心里话，不论他还是我，如果

反映到江青那里，那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我们都能相互倾诉，表明了我们之间信任的程度。

程师傅也是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唯一“善始善终”的人，从总体上说，江青从没找过他的茬；我离开江青那里以后，70年代周恩来还点名让他担任过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支部书记。我看，这也反映了江青的实用主义，大概她觉得，不论秘书、护士，都可以换，惟独适合她口味的厨师不好找到合适的人替换。江青被抓后，程师傅又长期在中央书记处做饭。他是“国宝”级的烹饪大师。现在北京南长街有个“泽园酒家”，就是程师傅的徒弟办的，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程师傅和毛主席的合影。

除了程师傅，我们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好。1967年夏天，我爱人来北京看病，住在钓鱼台北门外警卫连的家属宿舍。我们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很关心她，结伴去看她，连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也去了。三位警卫战士刘真、王振荣、李仁庆，除了替我陪她到医院看病，还不断地给她送些蔬菜，豆角啦、茄子啦等等，这些菜都是他们在江青所住的十一楼门前种的。按照当时毛主席的指示，钓鱼台的许多空地，不是像现在种的供观赏的花草，而是蔬菜和庄稼，毛主席住的中南海丰泽园也是这样。现在这些同志也都退休了。特别可贵的是，现在我们仍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毛主席的理发员周福明，也经常给我们工作人员理发。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也给我们工作人员看病。我要特别感谢江青的护士许春华，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许春华人既漂亮，又聪明，很得江青的喜欢。因为随侍在江青身边，和江青接触时间最多，因而对江青的脾气和性格了解得也最透。她不止一次地悄悄跟我说：“你注意点，江青疑心很大！”后来，她还跟我说了江青对我的看法。她说：“江青说你是书呆子，有时呆得好笑，有时呆得可爱。”江青具体指什么，她没说，我也不好问。说实在话，当时我对江青是很敬重的，没有丝毫的“设防”；受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吹捧江青的影响，以及江青本人也跟我谈过她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当时我把江青是看作革命前辈的。直到前几年，我问起许春华，她说：说你是“书呆子”有印象，但具体指什么也说不清楚了。她还告诉我，1968年1月我被关押后，她还受到我的牵连，被江青赶走了；好在得到汪东兴同志和毛主席的保护，未被关押，而被安排去支左，后来，又到大学读书去了。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